

“繁花”满眼：时代红尘中的上海风景

黄望莉



电视剧《繁花》剧照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恰逢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处处是机遇与希望。青年阿宝在高人“爷叔”、“夜东京”饭馆老板玲子与外贸公司职员汪小姐的鼎力协助下，快速成长为黄河路上无人不晓的宝总。然而，随着神秘女子李李与她的新式饭店“至真园”空降这条街，以及深圳股市“过江龙”强总的加入，宝总原本决胜千里的事业变得动荡惊心，他与身边人的关系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由金宇澄同名小说《繁花》改编的电视剧正在CCTV-8黄金档热播，并在腾讯视频上线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一时间，剧集连创佳绩，斩获“五个一工程”奖及“茅盾文学奖”原著再次点燃了公众的话题，和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叙事的“留白”与“互补”

作家金宇澄对《繁花》书名曾作注释：“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种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对金宇澄而言，《繁花》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必然不会全盘复制原著，“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对于“新生命”的锻造，导演王家卫以故事的里和面作为改编的遵循——作品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上海岁月、时代变迁。

电视剧《繁花》也正是在此叙事逻辑点上对那个时代及时代下的小人物展开描摹。剧集中的“繁花”带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则是剧集与原著之间互为“互补”与“留白”，影像在故事上丰满了文字的留白，而剧集的未竟处召唤着观众去原著中寻找答案、互为参照。这种创作手法在电影中常见。另一重“繁花”之繁或许在“王家卫电视剧”的作者属性里展开。此次，导演放弃以往电视剧线性叙事的惯性，采用了多线叙事，在人物与人

物之间搭建起叙事关联，以补充原著中需要填写的“留白”。

王家卫的剧集“首秀”《繁花》依然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王氏”高度风格化的镜头语言和双时间线交叉叙事。这部剧集在原著基础上去繁就简，将故事集中在“阿宝”的身上，习惯于第一人叙事并不断地将故事来回穿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物关系的前因后果关联，也道出了上海作为前沿城市的时代浪潮。

剧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以王家卫式的影像再现那个时代的景观之时，也

大量地插入了纪录片片段，真实的时代感扑面而来。至此，《繁花》以果敢而又激昂的叙事节奏引领观众走过时间的长河，剧情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转折，与角色内心的变化相互呼应，使得故事既富有悬念，又富有深度。

“上海性”人文景观的再造

观剧前对于王家卫导演的期待与疑虑并存。《花样年华》中的上海与

1990年代的上海各自在他的镜头下该有何区别？显然，这部剧集延续了《花样年华》中的高对比度光影的营造和饱和色块的大量使用，黄河路上过于密集的霓虹招牌无不昭示着交错迷离的观影体验。然而，客观来看，由于整个剧集有着明晰的故事底色，王家卫让人物的旁白和对白在吴依软语“嗲来兮”的台词的机锋下，展现了激烈的高战博弈。

剧集《繁花》用极致的匠心营造“上海性”，并将之放大和精致呈现。

首先是采用了完全真实地名的使用。如叙事的主要街道“黄河路”“进贤路”等，以及随剧情推进转场到的外滩27号、台词中时不时提及的西康路101号等，无不透露出浓浓的时代感和大上海在时代变革之初的独特性。

其次，剧集在前几集里除了主要交代时代变迁的故事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交代不同的人物性格和职业特征，以凸显角色所独有的上海气质。胡歌饰演的阿宝和唐嫣饰演的汪小姐人物线索非常明晰，不用赘述。而剧集中最具有叙事魅力的应当是马伊琍饰演的玲子和游本昌饰演的“爷叔”。玲子作为相对精明的女性形象，在阿宝的眼里，更是救命知己、有“侠气”的女人。“爷叔”是上海人对尊敬的长辈的统称，放在这里作为一种上海特有的、代表了传统上海经商人物的气质，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当然，李李作为新兴的商业代表、新兴的商业势力，进入到这一叙事空间，她所在的“至真园”也就与她的形象一样，成为经典空间和流动的人际关系中的“异质”。

上海趣味中投射上海精神

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作为时代发展的前沿，其过往历史再度登场，以“爷叔”为代表的旧时记忆再度引导了新一代“弄潮人”阿宝，他们的日常生活趣味体现在上海的美食描述、中西合璧的道具陈设、海派建筑与室内空间的呈现上。在这部剧集中，王家卫再次将镜头对准人物、对准光影中的芸芸众生。

在《繁花》的镜头里，充满年代感的上海弄堂，车水马龙的黄河路和南京路，都被细腻地捕捉和呈现，真实地描绘出了沪上弄潮儿女敢拼敢闯至真至诚的奋斗精神。比如导演采用了独特的剪辑手

段和叙事方式来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强调某些细节，营造出了全新的视觉效果和观剧氛围。而在展现阿宝在商场中的沉浮和纠结时，快速抽帧的剪辑方式，将阿宝在不同场合下的表情和动作进行拼接，从而展现出他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这不仅增强了剧情的紧张感，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阿宝这个角色的复杂性。

此外，以和平饭店为代表的上海融汇中外风格的装饰艺术，映衬出精致的日常生活；围放在六碟小菜中的上海泡饭、上海本帮菜青鱼秃肺、红烧划水等对上海美食的描述，既出现在时尚饭店中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商战故事，又在市井生活中。及至渗透在剧情细部的画面和台词——豆浆加串在筷子上的油条、朱家角的豆腐、崇明区的米糕、杏花楼的定胜糕等等，在剧中兼具地域饮食文化的知识普及，也融入人物命运纠葛和此起彼伏的时代画卷之中。这时而幽默、时而光辉的城市记忆，正是导演王家卫着力描摹和追求的趣味。

无论是同名小说，还是剧集《繁花》，上海风貌是这两者共同的创作价值取向。小说和剧集准确地抓住那个时代下这群人真实的风貌表现，也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市井生活画卷，艺术化地诠释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影像有影像的力量。无论是金宇澄笔下的《繁花》，还是王家卫镜头下的《繁花》，它不仅是一部展现上海繁华昌盛背景下的人间纷争的作品，更是一部在视听语言和制作手段上实现突破与创新的佳作——在成功还原了原著小说精髓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教授、电影与媒介中心主任)

走向“事件电影”：当下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一瞥

李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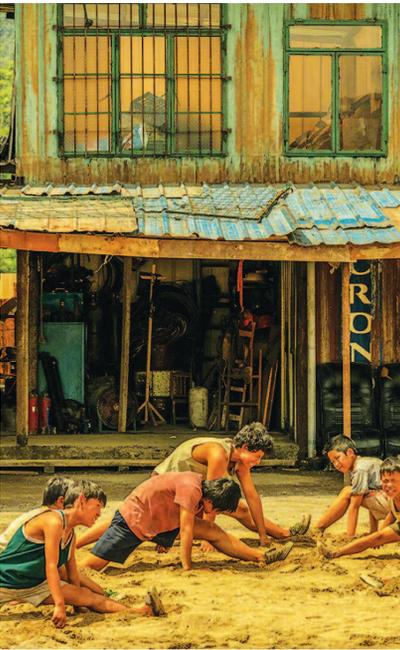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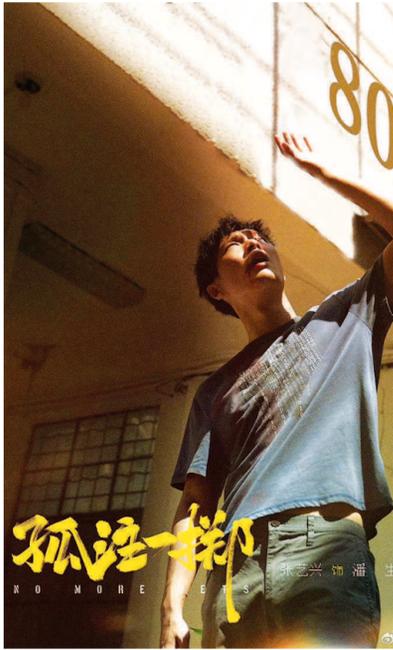
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电影迎来创作热潮。一方面，现实题材在市场上颇为走俏。例如，在2023年国产票房榜前十名中，《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八角笼中》《坚如磐石》《人生路不熟》五部现实题材电影占据半壁江山。与此同时，也涌现出《河边的错误》《我爱你！》《白塔之光》《涉过愤怒的海》等一批风格各异口碑力作，展现出丰赡的文本景观。整体来看，这波创作热潮主要是由两类作品带动而起：一类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另一类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电影。这两类作品多有重合交集，共同表现出对社会事件、现实议题的密切关注，并积极借“真实”“现实”之名来贴合大众情绪、制造观影话题、引发媒介狂欢，从中可窥见国产电影在理解现实、表述现实方面的进步与困顿。

取材真实：虚构的困境

在这波热潮中，有《消失的她》《八角笼中》《第八个嫌疑人》(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我本是高山》《三大队》等一大批作品基于真实事件、原型人物改编而来。许多电影在宣发时纷纷以“真实”作为噱头，例如电影《八角笼中》打出了“真实改编，震撼人心”的宣传语，《第八个嫌疑人》更是标榜“罕见真实，洞察人性”。

新闻话题、社会事件与真实人物有直接的指涉性，因此真实事件的改编常常能够提供一种虚构故事所缺乏的话题性与感染力。此类创作的一大要点，在于要适度把握真实事件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处理好虚实之间的张力。优秀的改编，一方面要坐实望虚，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想象与改造；另一方面要以虚证实，透过虚构故事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影片《八角笼中》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它将大凉山格斗孤儿的原型故事进行了较为顺畅的类型化改编。出身草根的王宝强，讲述了一个带有些许成长痕迹的底层故事，并动用了一批来自山区的非职业演员，在银幕上自我剖白。这种银幕内外的现实关怀，使得作品散发出一种少有的真实感与真诚感。

需要注意的是，真实事件的改编若处理不当，容易为原型事件所左右，进而落入“真实”的陷阱。例如，电影《第八个嫌疑人》在宣发时为了突出卖点，不仅在海报上打出“根据建国以来最大武装劫案真实案件改编”的标语，还着重圈出了“真实”二字。然而，恰恰是对于“真



2023年国产现实题材电影(从左至右)《孤注一掷》《我爱你!》《消失的她》《八角笼中》

实”的执着，使得影片过度忠实于案件本身而陷入虚构无力的困境。整体来看，影片几乎按部就班地参照原案件，展现了主人公从密谋劫掠、潜逃海外、改名换姓到最终伏法的全过程。故事平铺直叙，缺乏戏剧性与悬念感，几乎拍成了简略的案情回顾。真实原本是这部影片的亮点，最终却成为自身的镣铐。

追逐热点：话题的诱惑

除了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之外，基于各类社会热点、现实议题创作的影片也蔚然成潮。《保你平安》《孤注一掷》《我经过风暴》《我爱你！》《学爸》《坚如磐石》《鹦鹉杀》《涉过愤怒的海》《热搜》等作品集中涌现，聚焦网络暴力、电信诈骗、家庭暴力、老龄社会、家庭教育、贪腐问题等诸多热门社会议题。

在好莱坞电影的类型谱系中，有“社会问题电影”(social problem film)的专门类别。这一类别通常通过类型化手段，将社会分析和戏剧冲突集中在一个相对程式化的叙事结构中。从《我不是药神》等影片开始，我国的社会问

题电影也渐成气候，并在近一年来迎来爆发，其中不乏一些佳作。

例如，电影《我爱你！》以青春爱情类型介入老年群体情感问题，书写了国产影片中少有的恣意随性的老年爱情故事。创作者注入了大量青春爱情故事里常见的恋爱伎俩，但又表达得浪漫而不烂俗、甜蜜而不油腻。电影《涉过愤怒的海》通过悬疑片拆解家庭教育问题，透过生猛暴戾的影像风格，二次元与现实的碰撞、父辈与子女的代际冲突，揭露出锥心泣血的原生家庭之痛。电影《保你平安》以“喜剧+悬疑”的手法，借助主人公魏平安寻找造谣元凶的过程，描绘出信息传播高度网络化、平台化的后真相时代中，事实极易被情绪左右、真相极易被谣言遮蔽的现实图景。

需要看到的是，对于热点话题的追逐与热衷，使得许多作品体现出明显的工具化倾向。为了借助热点话题触发公众情绪、引发观影热潮，许多创作者急切地想要介入现实、剖解社会弊病、提出解决之道，从而使得影像的教化功能与社会意义大为凸显。例如，电影《孤注一掷》喊出了“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的口号，电影《学爸》也标榜“取

材真实，事关你我”。电影彰显其社会功能本无可厚非，但是过于强调功能先行就会使得情节与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工具化、平面化。例如，《孤注一掷》为了契合提升全民反诈意识的目的，将潘生、梁安娜、阿天、陆经理和阿才等一众反面人物严丝合缝但又粗浅僵硬地安排在应有的位置上，充当着反诈宣传片里的工具人。

另一方面，现实的奇观化也成为此类作品的一个明显趋势。关注话题本身，通过奇观化、暴力化、戏剧化处理来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成为许多创作者的有意追求。电影《孤注一掷》对于境外诈骗团伙内部的运作机制、诈骗话术、暴力手段等全方位的揭露，给观众带来陌生化体验，成为该片能够在去年暑期档期间大获丰收的重要原因。以反家暴、关怀女性的电影《我经过风暴》也走向了过于强调感官刺激的奇观化道路。创作者可能有意通过家暴行为的暴力化、恐怖化呈现来强化受害者压抑与绝望的处境，以此引发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警惕与反思。但对于施暴行为的过分渲染所引发的更多是观众的短暂情绪呼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反思的进一步深入。

类型化现实与事件化倾向

由此可见，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一大趋势是走向类型叙事与现实议题的融合。创作者日益擅长动用从外国电影工业中汲取的工业化经验，以结构严整的类型化故事来观照本土现实议题。而除了关注社会事件之外，当下现实题材电影还明显体现出对于制造媒介事件的热衷。随着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媒介平台日益成为电影营销的主导阵地，上文提及的电影在宣发期间，几乎都在各大媒介平台上开通官方账号，发布各类宣传物料，大肆制造各种互动话题与活动。类型化与事件化，正成为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明显趋势。

笔者将此类热衷于以类型化手段表现社会事件并积极制造媒介事件的现象称为“事件电影”。事实上，好莱坞早有此概念，用以指代那些营销或上映本身便是热门社会事件的现象级电影。此处挪用与扩展这一概念，意在凸显“事件”在当前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生产与传播中越来越醒目的地位，以及社会事件、电

影文本与社交媒介所构成的互动关系。

“事件电影”的流行意味着什么？其中的一大隐忧或许是，国产现实题材电影书写正走向日益简化的境地。一方面，在当下现实题材的类型化潮流中，创作者们越来越善于以类型片模式来框定与剪辑现实内容。裁掉现实的毛边，抹去生活的含混，原本开放无边的社会现实就会变得越来越僵化单一。看上去，不同的电影在以丰富多变的修辞方式讲述现实，实际上采取的是同样的模板与套路。

另一方面，对于稳固的社会结构和寻常的日常生活而言，社会事件是断裂、异常与变态。国产现实题材电影对于社会事件、热门话题的热衷，意味着创作者越来越关注那些表面上的偶发话题，而忽略了更多缺乏戏剧性的日常生活内容，同时也忽略了对话题之下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开掘与追问。就此而言，如何走出事件的迷障，直面现实的丰富与深度，探索类型叙事之外的更多修辞可能性，是国产现实题材电影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